

中国古代史上
儒法军事思想的斗争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

中国古代史上儒法军事思想的斗争

最近，党中央和毛主席号召我们，要学习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要注释法家著作。这是批林批孔中又一个伟大战略部署。中国历史上儒法两家的斗争，首先表现在政治上的斗争，儒家搞复辟、搞倒退，法家反复辟、反倒退，坚持革新，坚持前进。儒法斗争涉及到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有思想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军事是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也必然包括军事思想上的斗争，而且这个斗争是全面的，激烈的，你死我活的，贯穿了中国全部历史。

毛主席指出：任何军事原则都是“~~直接地~~和基本的政治原则联系着的。”儒家有一条“克己复礼”~~思想~~政治路线，必然有一条与之相适应、为之服务的军事路线，核心是一个“礼”字；法家有一条~~唯物主义~~的思想政治路线，必然也有一条相适应的，为~~无产阶级~~军事思想军事路线，核心是一个“法”字。军委五号文件~~指出~~“研究儒家和法家军事思想的斗争史以及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是深入批林批孔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当前批林批孔中，用马列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儒法两家军事思想的斗争和历史经验，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1）可以更深入、更普及、更有成效地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因为林彪的军事路线同他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一样，都是从孔孟之道那里来的。我们通过学习儒法军事思想斗争的历史经验，在看清儒家军事思想反动性的基础上，就可以较深

地认清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来龙去脉及其反动实质，就能进一步增强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思想、军事路线的自觉性。（2）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认清林彪宣扬孔孟之道的罪恶目的是搞复辟倒退，卖国投降。因为政治是全局性的东西，军事是它的一个局部，而且是一个重要的局部。我们通过对孔孟之道及林彪反动军事思想的批判，就会从整体上、实质上更加认清他们那条“克己复礼”的政治路线的反革命面目，进一步认识阶级斗争的规律，加深对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解，自觉落实“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

（3）通过学习古代军事知识，特别是学习、研究、批判地继承历史上执行法家路线的军事家、兵法家、著名将领的军事理论和斗争实践，对于提高我们的军政素质将会有所帮助。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林彪在军队中“搞文不搞武”，而且搞资产阶级的文，给我军建设造成极大危害。毛主席多次教导我们：军队要能文能武，文武双全。并举古代史上汉高祖刘邦说的“常恨隋何、陆贾无武，绛侯、灌婴无文”一段话，勉励我们，引起我们对军事方面的重视。因此，今天有机会学一点儒法军事思想的斗争史，对于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加强我军建设，是有很大大好处的。（4）通过学习、研究儒法军事思想斗争的历史经验，还可以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历史上不少执行法家路线的军事人物，过去被剥削阶级及其儒生的政治偏见歪曲、颠倒了。因此，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看问题要抓住本质和主流的方法，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比如，公元前二世纪初，胜利地领导了反复辟正义战争的大法家刘邦，过去就常被歪曲成粗鲁、俗鄙、奸诈的小人物，而一心以恢复东周奴隶制度为主旨的反动儒家代表项羽，却被描绘成了不可一世的“英雄”人物。又如三

国时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曹操，多少年来也一直
被歪曲成“乱世奸雄”、嗜杀成性的刽子手，也应该给以
“恢复名誉”。

军事思想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大体上包括三个部分：
一是关于战争方面的问题。比如战争的目的、性质，战争与
政治及其他方面的关系，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等等；二是关
于军队建设方面的问题。比如将帅的素质，军队的性质、任
务、管教、训练、以及上下、内外关系等等；三是关于战略
战术方面的问题。这里面涉及的问题更多了。古代战争，虽
然使用的是冷兵器（刀、枪、剑、戟、干、戈、等等。）但
是，由于它同样是在充满多种矛盾的复杂条件（如攻、防、
进、退，虚、实、强、弱……）进行的，单讲布阵，在春秋
战国时期就已有了“六十四阵”，每一个阵势（如“八阵图”）
推演开来，又有许多变化。所以，军事思想这个题目实在既
宽且大，思想性、政策性都很强。尤其对一些历史人物的分
析、评价，应有科学的态度。我们既不能搞虚无主义，否定
一切，又不能全盘继承，肯定一切。列宁指出：“在分析任
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
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就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
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他当时所处的历史条件，看他所代
表的阶级利益，执行的什么路线，全面地、历史地、本质
地，一分为二地予以评价。批判地继承历史遗产。那种不分
精华、糟粕，“无批判地兼收并蓄”，超阶级、超历史地把
一些执行法家路线的军事人物抬高到不恰当的程度，“以古
类今”，甚至“以古非今”，这都是要避免的。历史事件是
错综纷纭的，对一些军事家、兵法家、名将，他们究竟是偏
是法，不是一眼就可以看穿的。比如有的可能是儒中有法，

有的是法中有儒，有的是外儒内法，有的是外法内儒，有的是前儒后法，有的则是前法后儒等等。如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从表面看，他读了不少儒书，还讲点天命，要“恢复汉室”，续正统，象个儒家。但从实质上看，从他出隆中辅助刘备开始，在治国、治军方面，都是按照“法制”这条路线来搞的，从效果上看，在四川从根本上扭转了以往“刘璋懦弱”那种靠儒术统治的局面。而成为“兵甲已足”，“国以富饶”、又如张良，出身是韩国的大贵族，祖父和父亲历任韩国宰相，秦灭韩后，又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这应该算是一个很反动的儒家了。但自他参加了刘邦起义队伍之后，顺应历史潮流，推行法家路线，替刘邦“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累建奇功。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正当刘邦听从郦食其的主意，准备恢复六国旧贵族的政权时，得力于他的反对，才作罢的。所以从发展的观点看，张良是一个较出色的法家人物，这不就是“先儒后法”吗？而相反，与肖何、张良同时被汉高祖刘邦誉为“汉初三杰”的韩信，出身贫苦，讨过饭，参加刘邦队伍与项羽作战中，曾在正确政治路线指导下，率兵平魏、平赵、平代、平齐（均六国旧贵族），并且在山东一举歼灭项羽主力龙沮军廿万，可谓战功赫赫。但在战争过程中，他在反动“儒生”包围下，政治变质，思想复古，妄图割据称王。最后，为了达到复辟目的，阴谋实行政变（未遂）。这不是先法后儒吗？总之，“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对历史人物和事件要作具体分析，“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而陷于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片面性中间，就会颠倒了历史，混淆了是非。

在讲解的方法上，还有几点需要说明：第一，在介绍

中，着重在资料方面，同时也对比讲讲观点；第二，儒法两家，着重讲法家；第三，时间上，着重于古代；第四，内容上，分三个部分讲，不是分期讲；第五，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在每个大问题介绍完之后，概括地集中联系、批判、不零敲碎打的搞。关于历代劳动人民的斗争，因在阶级性质上同儒、法家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不打算更多涉及，否则，就会是不明不白，不伦不类，弄成一锅粥，反而把思想搞乱了。

第一部分：儒法两家在战争问题上的对立和斗争

首先，要搞清“什么是战争”？这个问题搞不清，就无法阐明战争的性质。资产阶级的军事家说：“战争是人类天性的产物”。德国本哈特讲“战争是万物之父”。总之，认为战争这个东西是永恒的。古今的一切和平主义者又说什么“战争是罪恶的渊薮”。笼统地叫喊反对一切战争。究竟什么是战争？按照马列主义观点看，战争是同政治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毛主席指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三个问题：第一，战争本身是政治性的东西；第二，是解决政治矛盾的一种最高形式，因为它是流血的政治；第三，因为政治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所以战争是有了阶级以后才有的，决不是什么“人类天性的产物”。若干年后，阶级消灭了，战争也不会存在了。所以对于战争持什么态度，直接检

验一个人对政治、对路线、对阶级的态度，这不仅 是区别儒、法的一个标尺，在今天也是鉴别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标尺。整个战争问题，分三个方面介绍。

（一）儒家为了“克己复礼”，疯狂反对正义战争，法家为了革新、进步，积极支持正义战争。

（1）儒家主“仁义”，羞战争；法家斥仁义，主战争。在春秋战国这个新旧两种生产方式、两种社会制度大变革时期，孔孟及其门徒，不惜冒风顶雨，“周游列国”，摇簧鼓舌，侈谈“仁义”，叫嚣什么“以政为德”，“以德行仁”，“以德服人”，以及什么“爱人”、“忠恕”、“正道”等等，把仁义道德吹得天花乱坠。把自己打扮成仁义之主，是“连杀一鸡犬尚且不忍”（王阳明语）的仁慈菩萨。一次，当卫灵公问孔丘关于打仗的事，孔丘说：“当兵打仗的事我没有学过（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拒绝回答，第二天就坐上车子走了。孟轲的面孔也是一个样子。一次，齐宣王对他说：“你能不能把当年齐桓公、晋文公争霸的事给我介绍介绍呢？”孟轲说：“伯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装的真是那么煞有介事。这方面还有一个典型，就是汉朝的董仲舒。当其在江都（今扬州）为易王当丞相时，易王有一天问到他关于春秋时期越王勾践施行计谋，终于灭亡了吴国的事，要他说说自己的看法。他立刻火冒三丈，冲口而出：“孔夫子的徒子徒孙们，连小孩儿都谈五霸的事，因为他们主要靠搞阴谋诡计取胜。”后世历代孔孟之徒，都是一个腔调。西汉昭帝时那般贤良文学们不也是大声疾呼要“偃武修文”，说什么“仁义道德才是最高尚的事，用兵打仗是可耻的事。”吗？自古以来，阶级斗争的规律是谁也逆转不了的，社会发展的趋势谁也阻挡不住。“螳臂挡车”只有自取

灭亡。子路是怎样死的？就是死在他老师那个“礼”字上。有一年，卫国发生政变，子路一个老上级孔伋在危难中，他为了“舍身取义”，就奔赴卫国救援。一至孔家，就同政变的武士们打起来。激战中，他受了伤，帽子被打歪了，上面的丝带子也打断了。这时他仍念念不忘那个“礼”。于是就放下武器，大声叫喊道：“孔夫子教导我们，‘君子就是死，帽子也要戴端正’。”于是放下手中武器整起帽子来。正在这时，武士们蜂拥而上，把他剁成了肉泥。一个人如此，一个国也如此。有次，齐国要进攻鲁国，鲁国派了孔老二的门徒、说客子贡用仁义之道去说服齐国。齐王说：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我需要的不是你们那套空话，而是土地。于是出兵直打至鲁国都门外十里路的地方。这就是对空谈仁义的惩罚。

法家针锋相对，愤怒地斥责孔孟之师贩卖的仁义道德。商鞅公开把诗、书、礼、乐、仪、孝悌斥为“六虱”，是祸国殃民，说谁用了它就会“削国”、“亡国”。并且建议秦孝公把他们一火而焚之。韩非在《五蠹》篇中指出：现在中国之所以混乱，不能统一，根本原因就在于“修仁义而习文学”。他把那些鼓吹仁义道德的孔孟之徒同游手好闲的寄生虫，同投机商等并列为“五奸”，坚决主张把这些家伙们镇压掉。他这个意见，一直到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后才得到实现，实行“焚书坑儒”。但由于历史的局限，秦始皇也干的很不彻底，只杀了四百多个反动儒生，留下了后患。

列宁在批评那种无条件赞成和平、反对暴力的谬论时指出：“在历史上，还没有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不是用暴力来解决的。”法家正是这样的暴力论者。商鞅认为：现在，一个国家只要能够抛弃“仁人”，讲求武力，“敌人就不攻

来进犯，即使来进犯也会遭到失败。自己出兵进攻别人，也必定会胜利。”大兵法家孙臆同样认为：儒家鼓吹的那套“责仁义，式礼乐，垂衣裳（裳）”，是根本行不通的，坚决主张“以兵绳之”（意思是“用战争解决问题”）。

（2）儒家极力宣传战争恐怖，旨在反对新兴地主阶级进行的正义战争。法家认为战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坚决主张“以战去战”。用暴力摧垮旧的统治。历代儒家信徒，出于其阶级本性，害的是软骨症。他们极力散布“兵凶战危”，把战争渲染得十分可怕。说什么：“战争，象火一样厉害，如不赶快扑灭，最后连自己也会烧死”。又说：“兵，是凶器，强大的军队和优良的装备是天下的灾难”；叫嚣什么“一场大战所代来的损失，几百年都恢复不了（‘大军之后，累世不复’）”。他们故意危言耸听，说战争使得“田地里一片荒凉，城市里空空荡荡，到处听到的是老婆婆的哭声，看到的是少妇们悲伤的泪痕”。等等。把当时正义战争描绘的“凄凄惨惨戚戚”。尤其可耻的是，为了制造“歇嘶的里”的战争恐怖，以蛊惑人心，后代孔孟之徒们，不惜采取卑劣手法，编造出了“孟姜女哭长城”的丑剧。俗话说：“醉翁之意不在酒”。为什么孔孟之徒在春秋末期，特别是在战国中期以后拚命鼓吹“兵凶战危”呢？不正是孔老二曾亲自派子路率师去摧毁鲁国季孙氏等的都城（“堕三都”）吗？不正是这个孔丘，当听到齐国新兴地主阶级实行革命性的政变之后，怂恿鲁襄公出兵平乱吗？现在他们怎么突然换了一付面孔讨厌起战争来了呢？原来，那个时期正是奴隶制“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时代。政治上，“礼崩乐坏”了；经济上，“井田”废了，“阡陌”开了；思想意识上，孔孟之道被批得臭不可闻，连孔老二自己也哀叹：“我这套道理吃不开了，我

只有到海上飘泊一生算了”。正是在这种旧的基础面临全面崩溃情况下，孔孟之徒才极力鼓吹“仁义”，才“羞言战事”，才贩卖战争恐怖的论调。他们甚至赤裸裸地咒骂新兴地主阶级进行的正义战争，是“杀百姓，危国家”；诬蔑法家是逞“霸道”，“嗜杀人者”；孟轲更恶狠狠地攻击这场正义之战是“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叫嚣要将执行法家路线的军事家、兵法家“处以极刑”（夫善战者服上刑）。

毛主席指出：“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站在历史车轮前头，代表着新的生产力量。他们认为：战争不是什么“恐怖”，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杰出的法家代表商鞅，用朴素的唯物论和进化论的发展观，解释了战争的起源和必要性。他说：远古的时候，是没有刑罚也没有战争的，后来到了皇帝的时候，有了君臣上下，出现了争夺，就需要“内行刀锯，外用甲兵”了。他在这个时候，就看出了战争起源于私有制，起源于阶级（当然不是很明确的），这是很不简单的。韩非也用发展的观点指出：“时代变化了，情况也随之而变化；情况变了，治国的办法也应该相应地改变（“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用什么办法呢？重要的是加强武装力量（“当今争于力气”）。总之，照法家看来，战争是正常的，不是反常的，是好得很，不是糟得很。他们大造革命舆论，积极宣传进步战争对于摧垮反动社会制度的必要性。所以，在战国中期以后谈战争成了一种社会风尚。那个时候连一般老百姓都喜欢谈论战争，并以参战杀敌为荣。韩非在《五蠹篇》中指出：“境内皆言兵，藏孙、吴（孙，指孙武，

齐人，后去吴国，是个大军事家，著有兵法十三篇。吴，指吴起，魏人，曾先后在鲁、魏、楚等国做将军，著有《吴起兵法》（兵法者家有之”。还说：“今之争夺，非鄙也”。秦国的商鞅公开对奴隶主阶级挑战，说：我们就是要用正义的战争，消灭你们不正义的战争；就是要用杀戮的手段，来还击你们的残杀（“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我们还看到，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在坚持分裂，还是维护统一？在外敌入侵面前是屈辱投降，还是坚决抵抗？答案只有一个，这就是用战争手段解决问题。别的出路是没有的。更不用讲孔孟之流那套什么“仁政”、“王道”的鬼话了。我们都读过毛主席《沁园春·雪》这首词。毛主席在词的下半阙列举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以及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蒙古族的英雄人物，他在十三世纪初，用武力手段统一了整个蒙古族，并使之从此强大起来）上述人物都是采用战争形式统一国家（民族），或者抗击外来侵略，用兵出谋，武功赫赫，有所贡献，应该给以肯定的帝王（当然，这中间唐太宗及成吉思汗在他们后一段对外发动的侵略战争，那是不能肯定的）。特别是秦始皇，这个“千古一帝”的杰出政治家、军事家。他是一个彻底的革命战争论者，在他执国政后的整个岁月中，几乎都是在领导“剪除六国”进行统一中国的战争中渡过的。秦始皇顺应了历史前进的潮流，制定了一条符合人民利益的以统一为中心的政治路线；他以无比的魄力，领导了名将王翦、王贲父子进行统一战争。并在紧要关头，三次亲临前线直接组织、指挥了伐韩、平赵、灭楚的几次重大战役。这里，还应该把大法家汉高祖刘邦简单介绍几句。他从公元前 207 年起兵，到病故的十余年间，先后在形形色色的复辟势力、同匈奴作战

中，几乎每次都是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他尝到了甜头。这正如他在平息了淮南王英布后顺道回故乡，在一次老乡们举办的招待会上高声朗诵的一首战歌（《大风歌》）里所说的：“我在战争的狂风阵云中锻炼成长，我以强大的武力平定了天下，光荣地回到故乡，我啊，还要招纳、培训更多的将士保卫我的国防！”

（3）儒家宣扬“小国师大国”，大搞投降主义；法家主“兴义兵，诛强暴”，反对外来侵略。孟轲胡说什么“小国师（服侍的意思）大国，要不以为耻，就象学生侍候老师不以为耻一样”。为了证实他这个大国、强国侵略有理，小国、弱国投降合法的谰言，他还举例发挥。一次，他问齐宣王：邹人（邹国是当时山东的小国，即现在邹县）与楚人战，你认为那国胜？”宣王答：“楚胜”。孟轲就说了：

“从这例子可以完全证明：小不可以敌大，寡不可以敌众，弱不可以敌强”。并且，他还具体地有一整套投降卖国的政策、步骤、措施那就是“先送皮毛丝绢”，不行，“再送珍兽名马”；不行，“再送上珍珠美玉”；再不行，就干脆“把国上连京城都送上”，这就避免了侵略了。就在孔孟这条可耻的投降主义路线指导下，一些原来还比较大点的国家，也越来越弱了。比如卫国在春秋时期同鲁差不多一般大。由于不用商鞅（商鞅原是卫人，叫卫鞅）用儒徒。大搞投降外交。一时“师”赵，一时“师”魏，一时“师”齐。国土越来越小，商鞅离开后不过四十年，就只剩下一个县的地盘；国土的尊号也由“公”而“侯”、再降为“君”。孔孟的谬论，开了儒家投降主义的先河。西汉时的反动儒生面临匈奴侵略，大肆散布“战备无用”、“抗匈必亡”，要求政府“废兵革”，“撤边寨”，多送些钱去乞求和平。宋朝顽固派的

头子司马光胡说什么：“宋朝地方大，割去一点不算什么”，甚至建议在敌人索求之外，再送一些土地，以求得边境的安宁。南宋投降派头子宋高宗赵构，胡说向金人屈辱求和，为的是“息兵养民”，是他“一生的志愿”。大卖国贼秦桧叫嚣要“用诚心对待敌人”，并说：“向金称臣进贡，屈膝投降，是皇帝的孝道。”以后的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无不“师承孔孟”，都是些“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对帝国主义奴颜婢膝卖国求荣的反动家伙，他们的目的仍在镇压革命人民，维护反动统治。这从司马光的两句话便可看出：他认为外族入侵，只不过失“寻丈之地”，是“手足之疾”，而国内人民起来造反，则是“腹心之忧”，会彻底摧毁他们的反动统治。

法家，由于他们所处的阶级地位，或是先进阶级的代表，或是地主阶级内部先进阶层的代表，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这决定了他们对外敌入侵的态度是：不畏强暴，坚决抗战。韩非针对孔孟之流胡说什么“国家弱小，就一定要臣服强国大国，别人来进攻，就举手投降。”给以有力驳斥，说：这“完全是一派奸臣的胡说八道”。他指出，小国、弱国要摆脱大国、强国的干涉、控制，关键在“务力”（壮大自己力量），在“争夺”（有一支强大军队作后盾，以抗击侵略）。说：力多则人朝，少寡则朝于人”。地处西方的秦国，就是这样在这条法家路线指引下，自秦孝公用商鞅变法到秦始皇即位，一百余年间，由一个地方偏僻、人口稀少、经济落后，一贯被“山东六国”小视的弱国，一跃而为战国七雄中最先进、最富强的诸侯国，具备了统一六国的有利条件。

以后，历代的爱国者们继承了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所实践

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路线，在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参加下，在反侵略的伟大事业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在封建社会上升时期，由于有一条正确政治路线的指引，涌现出了大批反侵略名将。就是在封建社会后期，也还是断断续续地出现了一些可歌可泣的爱国者。东晋是个腐朽的朝代，那时中国长江、淮河以北的土地，被匈奴、鲜卑、羯、氐、羌等五个奴隶主贵族占领，并先后建立起十六个国家。东晋王朝苟且偷安，享乐腐化，不图恢复国土。当时，爱国名将祖逖，胸怀大志，一身以抗击侵略，恢复失地为奋斗目标。他在少年时和他的同学刘琨在一起读兵书，练武艺。清晨一闻鸡鸣两人就起床舞剑，晚上头枕干戈（兵器）睡觉（这就是“闻鸡起舞”和“枕戈待旦”两个成语的出处）。晋愍帝时，经过祖逖多次要求出兵“北伐”，愍帝勉强同意，但只给他一千人的粮食和三千匹布，叫他自己设法去募兵造兵器。但他一点不灰心气馁。在他率领几百士兵渡长江时，为表示决心，用手中楫劈开江水，说：“复济者，有如此江”（意思是，不打败敌人，宁肯葬身江中，也不再渡江退回南方去）以后，果然，祖逖在人民群众大力支持下，在他“以法治军”路线的指导下，很快练成一支精兵，累次打败敌人，恢复了黄河以南的全部国土。但是，后来终因上面政治路线错误，祖逖受到排斥，悲忿的死去。北宋大法家王安石变法，重要原因之一是他反对在外敌（西边的“夏”党项族，北边的“辽”——契丹族）面前屈膝投降。他在给宋神宗报告里写道：“今（指宋皇帝）乃称契丹母为叔祖母，称契丹（指辽国国王）为叔父，臣实耻之”。他变法的总方针是：“理财、整军、富国、强兵”八个字，变法的内容中，直接加强战备方面的如：实行保甲法，编练民兵（全国共组织民兵

710万），设立制造兵器的专门机构；在边境地方置“将”（布署用法制观点练出来的新军），为了培养出一批干练的将帅，开办了军事学堂（这是中国第一个军官学校）等等，都是变法的重要内容。岳飞是南宋初年抗“金”（女真族）杰出的爱国将领。他一生的主要事迹，是在抗击外族侵略中渡过的（中间一度参与镇压过农民起义）岳飞自幼就具有爱国思想，喜欢读孙吴兵法，经常练习武艺，在青年时代，即参加抗金战争，立下战功，以后升任大将，负责指挥今湖北一带的抗金部队。1139年，南宋第一次向金屈辱求和获得成功，宋高宗、秦桧等投降派十分高兴，给官员们加官进爵，也升了岳飞的官。岳飞上表拒不接受，说：“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忧而不可贺，可以训兵励士”“不可论功行赏，取笑夷狄（指金人）”。1142年，金人撕毁和约，重新挑起战争。岳飞率军反击，在敌占区广大人民群众支持下，一直打到距开封四十里的朱仙镇。但是，终于在南宋投降主义路线迫害下，死于狱中。南宋前期，另一个爱国军人，大诗人陆游，一生的愿望，是盼着政府打回北方，收复失地，免除屈辱。到他临死前还给予子孙们留下嘱托（诗）。诗中写道：“死去愿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指宋朝军队）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

从上面的事实中可以看到，在战争问题上，小国、弱国在大国、强国侵略面前，是屈膝投降还是坚决抵抗？这成了儒、法两家政治军事路线尖锐对立的一个重大问题。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千秋功罪”昭在史册。历史上那些执行法家路线的爱国者们，一直为人们称道、讴歌，千古流芳；而那些阻挠历史车轮前进的“腐儒”、“坚儒”之流的卖国者们，千百年来总是“千夫所指”，“遗臭万年”。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孔孟之流在战争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是为了“克己复礼”。因此，他们一方面交替使用“宽猛并济”的反革命两手，对劳动群众和新兴地主阶级大肆镇压。另一方面，又凶神恶煞地把进步的战争视为洪水猛兽，拼命反对，以顽固地维护他们那腐朽、没落的反动势力。而法家则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顺应时代的潮流，在战争问题上，实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坚决用进步的战争制止那些非正义的战争。目的是为了反复辟、反倒退、反侵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树春。”历史雄辩地证明，孔孟之流腐朽的战争观彻底破产了；而法家却在广大劳动群众支持下，赢得了又一个又一个战争的胜利。

(二) 儒家鼓吹“去兵去食”，法家主张“足兵足食”。

这一个题目同上一个题目，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里着重介绍保证战争能够顺利进行的两个最基本的条件。毛主席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暴力的胜利”需要依据于“经济的力量”。自从有阶级以来，凡是要进行战争，总是需要具有充实的物质基础，否则战争就进行不下去。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孔孟之流却别有用心地鼓吹不要军队，不搞经济。孔老二在一次回答门徒子贡的话时胡说什么：“去兵”、“去食”、“存信”；还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里的信还是“礼”的意思）；孔轲进一步阐明孔老二这个反动思想。他说：“一个国家，经济落后，武力不强，不是害处。如果抛开了“礼”，那才是最可怕的，甚至很快会灭亡。”西汉反动儒生和孔孟一脉相承，鼓吹“善于致胜的不用战争，善于作战的不用军队”，并且要政府“取消盐铁国营的政策，不要搞“利”。北宋时反对王安石变法最烈的

苏轼也贩卖什么：“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不在乎富与贵”。“万变不离其宗”。春秋战国时期，孔孟之流正当新兴地主阶级日益强大的时候，贩卖这套货色，目的是为了叫别人“放下武器”，便于他们复辟、倒退、投降、卖国。在这个问题上，苏轼一语道破了真谛，他说只要反掉王安石“富国强兵”的变法，便“天下归仁”矣。他们那里不要兵？《左传》上明明讲了“国之大事，在祀（祭祀即“礼”）与戎（兵）。”他们那里不要食？孔老二当鲁国司寇，一年俸禄是六万斗小米，一粒不能少。毛主席说：“世界上没有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事情正是这样，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里，任何阶级都维护和坚持本阶级的利益。一切政治、道德、哲学概念都是一定阶级利益的反映。反动的没落奴隶主阶级，由于其阶级利益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完全对立，与社会发展的方向背道而驰，不敢公开言利，只抽象地讲什么永恒的仁义道德，以掩盖其卑鄙私利。而法家作为当时先进阶级（或阶层）的代表，其阶级利益与生产力一致，与社会发展的方向一致，所以敢于公开言“利”。他们在长期斗争实践中，深深懂得足兵足食的重要性。春秋中期作为齐国宰相的管仲，辅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五霸”之首。主要是管仲执行了一条法家的正确路线。他说：“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兵强，兵强则战胜，战胜则地广”。这段简短的话，充满了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的道理。并在实践中得到了证明。这里附带需要说明的是，春秋时期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等在法家人物帮助下先后进行的争霸战争带有进步的性质，是使中国走向统一的第一步，为日后秦国的统一